

清末民初报刊知识分子“推广日报”的覃思、昌言与求索

施 欣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广州 510225)

摘 要:晚清以来,深具家国情怀的报刊知识分子成为思想先导和时代先锋,强调“睁眼看世界”的报人群体必须深念国忧、心系民瘼,主张“挹彼欧西学术,启我同胞聪明”的先进报刊必须担荷先觉之责、履践前驱之能;“新”国家必自“新”国民起,造育新民为振刷国家、荡涤民族之先决条件,化育民智、启迪民氓为改良鼎新之当务之急;唤醒迷梦、追求光明、蔚成舆论、匡辅当世,“先觉觉后觉者”的报人厕身其中、与有任焉;设报达聪、去塞求通、清除时弊、消弭外患是户牖民众、启蒙民人的不二法门;推广日报、普及新知、灌输理念、传通天下是拯济吾民、振兴国家的必由之路。

关键词:亟宜推广日报;报刊知识分子;先觉之责;家国情怀;清末民初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考镜中国近现代新闻传播史可知,近代报刊是近世文明进步之结晶体、文化昌明之晋升梯,但是,“古代报刊因不具备适宜的生存环境与充分的进化条件而无法向近代报刊演进”^[1];也就是说,古代中国并不具备独立生发出近代报刊的土壤和气候。近代报刊最早由西方传教士出于传教的实际需要将其偷偷摸摸地“带到”中国,而且这样的新生事物传入中国的道路并不一帆风顺而是充满艰辛与崎岖,当年的传教士甚至必须冒着生命的危险(如英国人马礼逊每次外出“授课”时随身携带毒药和草鞋。草鞋方便逃跑,毒药方便逃不脱时自我了结)。近代报刊的中国化、本土化、大众化、普及化是一个渐进的历史过程,其发展之途并非径情直遂而是遭遇诸多磨砺,隐藏在它背后的报人群体兼有传统文化的烙印和近代人文的痕迹。

彼时,报刊无疑是传播先进文明与发达科技的最佳手段与最优方式,犹如今天的互联网、手机、多媒体一样具有无与伦比且“难以抗拒”的思想文化

传播力、到达率、渗透面、影响力;报刊知识分子在其中无疑扮演着先知者的角色、承荷着先觉者的职责,他们必须时刻走在社会前列、时代前茅并引领社会、引导民众,不仅要向昏昏欲睡、酣然入梦的广大民众发出震耳欲聋、响彻云霄的呐喊与警醒,更要向“垂垂老矣”的国家敲响抵御外侮、强我华夏的一声声警钟,担负作为公共舆论空间先导与先进文化代表所承担的社会监测及预警功能。

一、清末民初报刊知识分子提出 “亟宜推广日报”观点

近代以来,面对深重的民族危机与巨大的民族灾难,保国保种、救亡图存一度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政治任务和努力方向,进而转变为一场又一场紧迫的全民行动,从变法维新、到政治改良、再到民主革命,以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自强于列强竞争之世,改变“吾国”日益式微的国际地位、日益沉沦的国家形象,同时挽回日渐损害的民族尊严、日渐断丧的人民权益。当时,复兴国家、振兴民族、挣脱列强

基金项目:韬奋基金会年度规划课题“韬奋精神与近现代出版史研究”(TF2025100)

作者简介:施欣(1984—),江西宜春人,博士,仲恺农业工程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史。

之爪牙成为先进的中国人尤其是开眼看世界的报刊知识分子、士大夫、政治家、改革家、思想家一致的政治诉求与改革愿景。

曾经“老大”的中国——过去遥遥领先、一枝独秀的华夏文化与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创造出了令亿万国人无比骄傲与自豪的“煌煌盛世”——辉煌与灿烂的世界强国。所形成的“中华文化圈”“儒学文化圈”不仅在世界历史上引领了世界文明、全球文化的前进方向及发展趋势，而且至今依然具有文化思想、政治外交、军事战略、国际贸易等方面的独特作用力，这种特殊且显著的影响力或隐或现、或明或暗，潜移默化、润物无声。作为全世界令人神往的“东方巨龙”，无论是经济上（占全球GDP40%左右），还是政治上（万邦来朝、四夷宾服），抑或是文化上（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古代中国当之无愧堪称“世界的中心”。但是，鸦片战争失败后，西方“不速之客”用坚船利炮强行打开了“深闭固拒”已久的中国大门，列强争先恐后、明火执仗地闯入了自给自足、独立行使主权的清帝国。国外各路强盗的纷纷闯入、国内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令中国最后一个封建朝代焦头烂额、疲于应付，清王朝走到了山穷水尽、摇摇欲坠的地步，可谓内忧外患的多事之秋、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有识之士一针见血地指出，“咸以瓜分中国为言，若箭在弦，省括即发。瓜分豆剖，渐露机牙。”^[2] 习近平总书记概况性地指出，西方列强的侵略与掠夺、践踏与蹂躏，“使得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3]。然而不幸的是，面对国难日蹙、时政堪虞和人民沦胥、神州陆沉的困顿与窘境，曾经长期领跑世界、独领风骚并创造出“令西方社会望尘莫及”^[4] 先进文明的东方大国，却仍然在“天朝上国”的“迷雾”之间、在“万国朝贡”的“虚妄”之中不愿意、也不想醒来，继续骄矜自负、颞预蒙蔽，继续坐井观天、夏虫语冰。

晚清时期，末代帝国已在各个方面全面落后于西方资产阶级新兴国家，反观西方列强却凭借工业革命产生的巨大能量发生了狂飙式的发展。泱泱大国的滑落无声无息、衰微一夕之间，清廷朝野上下（官方或民间）对此却依旧酣睡入梦、昧于世界大

势，反倒处处显示出狂妄骄矜和盲目自大。回眸百年沉沦屈辱史，向人们展示了这么一幅真实图景：昏睡沉沉、骄傲满满的封建中国哑然失色、每况愈下——社会停滞不前、经济凋零腐败、政治腐朽堕落以及思想界、学术界、文化界、科技界、教育界均一片万马齐喑、死气沉沉，它像极了蜗牛蜿蜒摸索、老牛疲惫前行，犹如昏灯黯淡无光、房屋年久失修，貌似庞大的帝国其“崩溃”或在一瞬之间。传统读书人只知耗费心血走“科举仕进”的老路，封建士大夫也矮化变身为皇帝的家臣或奴才，乾嘉学派则只顾埋首“故纸堆”（如考据学）以避“文字狱”的灾祸，中国近代历史的衍变与演进似乎按下了“周期律”和“循环律”的播放键。对此，外国评论家深刻分析说，如果不是靠着“还算过得去”的船长掌舵与引航，中国这艘巨轮很可能会触礁、被海浪击打得粉身碎骨。

在“落后就要挨打”血淋淋的教训中，幡然醒悟的中国思想家、政治家、社会改良家尤其是报刊知识分子，不约而同地把学习的目光投向了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思考他们先进的原因、发达的缘故进而看到和承认差距，从起初学习他们的机械、器具、技术、设备等“浅层”内容，再到深入学习他们的报刊、法律、议院、教育等“深层”东西。随着中国知识分子对新学新知的认识逐步加深、对西学西艺的理解逐渐深入，他们关于现实的思考和社会的实践也在渐渐深化，慢慢意识到西方文明及制度的先进性——包括对报刊这种强大的大众传媒及宣传工具的作用、功能、属性、特点的了解和认知同样在持续深入。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中国封建社会处于“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李鸿章语）当中，中国传统文化亦处于急遽转型时期。来势汹汹、裹挟一切的西方各种科学与技术、学说与思想，这些“舶来品”在中国大地快速地传播及转化。先进的文化、强大的科技要普遍地传进来，进步的思想、领先的理念要广泛地涌进来，那么，报刊毫无疑问必须参与这个进程。这是因为，百年前盛行的报刊是人类社会第一次真正掌握的深具权威性与公信力的大众传播媒

体,具有强大的传播“伟力”和宣传“威力”,是任何政治改良运动、变法图强实践都绕不开的宣传工具、舆论空间,古往今来无一例外、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旧邦维新,是中国社会发展和文化繁荣过程中的重要原则之一。”^[5]故而,维新旧制度、变革旧体制需要报刊的极力宣传与大肆鼓吹,促使亿兆百姓从臣民向公民过渡,报刊的教育与启蒙同样不可或缺。

鉴于清末民初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外交、国防等国家时局(包括国际形势)的糜烂不堪、日薄西山,许多报刊知识分子基于他们的办报实务与从业经历得出了向现代转型、向文明过渡的痼疾已久、积弊沉疴的封建中国“亟宜推广日报”的重要结论,郑重提出报刊愈多则人民愈聪明、报刊愈多则社会愈进步、报刊愈多则风气愈开明的观点,要求在“滞留”“壅塞”“踽踽独行”“蹒跚摸索”的“老大中国”大力推广报刊、积极普及日报,主张在中国境内遍设报馆、遍立报社,要求国家和社会大兴报刊、大举报业。处于严重民族危机的“非常时期”,提振报业、广建报馆不仅势在必行而且时不我待,以此推动中国由传统农业社会转变为工业社会、由农耕文明过渡到工业文明。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一个国家或民族如果长期自我封闭、自我囿限或墨守成规、故步自封,那么它将落后于时代大潮、落伍于世界大势,最终被历史残酷地淘汰出局。

所谓“亟宜推广日报”,既指的是时间和空间上的迅疾,又指的是态度和立场上的坚定。这里的“亟”是强调兴办报业、昌大报社、形成庞大的报人群体并使之成为一种社会行业和正规职业;掀起国人办报高潮是一件刻不容缓、当务之急的大事要事,甚至可以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的高度,事关国计民生与国是民依。当时,报刊这一不可替代、不可或缺的公共事业与大众行业,是国家对外形象、国际声誉及民族文化“软实力”的一种集中体现,抵抗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与进犯、夺回与维护中国自己的利权,都离不开大规模办报和大批量创刊。更何况,晚清之时中国报业步履维艰、如履薄冰,与国外新闻传播事业相较尚未发达、远未崛起,自当孜孜以求进步、兢兢设法推广。这里的“宜”是突出发展报业是于

国于民大有裨益的事情,当此之时极为适宜和妥帖、极其合宜和贴切;特别是造育“新民”必须通过报刊、启悟公众必须经由报章,改造积重难返、流弊泛滥的国民劣根性同样离不开报刊的宣传鼓动与传播扩散。

显然,培育民主共和、文明富强的“崭新”国家和聪明智慧、崇德尚品的“新质”国民,没有报刊参与和撑持肯定是不行的。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报刊是当时人类社会创造出来并被真正掌握的最为高效和最为实用的宣传利器 and 传播工具,突破了传统传播媒体、简易传播手段的时空限制,堪称比较完美的“第一方阵”大众传播媒介。报人们深以为然的是,作为媒介发展史上近代文明之利器、思想文化之载体、政治民主之工具、基本知识之平台、启蒙民众之灯塔、指引光明之火炬,报刊及其刊登的各类文字——公开的新闻报道、公正的媒体评论、发表的文学作品,其背后承载的思想与文化、传播的信息与资讯、发布的价值与观点,于个人于民众于社会而言都非常重要,于国家民族、于当下未来而论均相当珍贵。

中国的“先进分子”特别是自许为“先知先觉者”的报刊知识分子,纷纷引进国外各种学说、大力昌言西方资产阶级各种思想,将覃思与探索民族复兴的道路及其方法的目光投向欧美发达国家,给传统守旧、封建保守的中国带来了一股股“新鲜血液”和“清新空气”,让原本已经腐朽不堪、黯黯许久的古老国度——好似“深处密不透风的铁屋子”(鲁迅语)和“一具长时间躺在棺材里的木乃伊”(马克思语),如同被突然置于民主、科学、博爱的空气中和暴露于平等、自由、文明的阳光之下一样,新思想、新文明、新风气涤荡着旧中国、旧社会、旧传统,洗刷着旧时代、旧风俗、旧理念,催生了中华大地汹涌澎湃的新的社会思潮。转型中的中国知识分子、渐变中的报人群体探时弊而求发展、针砭痼于膏肓,他们不甘屈辱、决意振作自强,不甘为奴、决心奋起直追,始终站在救亡图存前列的正是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群体,“他们不但要求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而且进一步提出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制

度和社会制度”^[6],表明了作为榜样和示范的知识分子报人初步具备现代眼光、民主理念,对于如何向西方寻求救国道路、救民真理的理解与认识在逐步加深。自此,他们为推翻清朝腐朽黑暗统治而奋笔疾书、大声呼喊。

这些昌言改革、力主维新的新型报刊知识分子,当仁不让地成为救国救民、救亡图存的仁人志士——社会改革的探索者与自强求富的先驱者,他们深怀一颗忧国忧民、胸怀苍生的爱国之心,怀揣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政治理想。面对民族陆危、国家倾颓,他们力图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通过自己的奔走呼号、大声疾呼挽救社会颓风、拯救政治时弊,通过自己的舍生忘死、取义成仁化解民族生存危机、避免国家沉沦堕落。这些爱国爱民、开明开放、觉醒觉悟的报刊知识分子,不仅是具有社会良知、监测国家风险、身怀家国理想、满怀报国家志向的先进文化“新人”,而且要运用自己刚正不阿的“笔”与仗义执言的“舌”,察机微、规时势、综本末、正人心、开风气、引潮流。他们延续着“以文辅政”的清议风骨、赓续着“以文论政”的文人风气,为国家民族复苏及重振“鼓与呼”,也为天下苍生福祉及利益呐喊与呼吁,被时人赞誉为“舆论家”“新式文人”“启蒙思想家”,被普遍视为社会进阶的推动者、国家前进的引路人、文明演进的助推者、未来发展的寻路者。事实上,代表先进文化发展方向的报刊知识分子,通过他们手中犀利且辛辣的“笔”,大胆揭露封建王朝的腐朽与败落,无情揭破军阀独裁者的昏聩与愚昧,替人民利益发声、为老百姓代言,捍卫国家尊严、拱卫民族地位,承担教育人民的导师、规避风险的领航员之职责,为国家自强与民族振兴刮摩淬励、起衰振隳。

二、“重报”乃强大国家、振兴民族之根本

报刊是一种带有“公共意见”特质的意见交换系统,该系统因其定期固定出版、带有制度化特征以及产品实现了技术化的大批量统一印刷,为人们提供了公共讨论、彼此互动、信息交流、情感共鸣的平台与空间,报人凭借媒体和舆论构成“报刊-读者”共同体,使其言论成为近代中国一种新的资本并影

响近代政治进程。于是,报刊知识分子强调不仅要在国内遍设报馆,而且要形成尊重报人的社会氛围,重视并发挥报刊的作用是强大国家、振兴民族的根本之途。

报刊对于一个渴望变革、希冀改良的落后国度的极端重要性,不少报刊知识分子兼维新思想家有过精彩的论断。来华传教士花之安论析说:“凡类于书史有益于身心者,吾人皆常博览,以增识见,以开智慧,则新闻纸之设此其选也。盖新闻纸之文,上自朝廷百官,下及商贾庶民……即今日之时势,今人之是非无不畅谈,不必趋避。”^[7]近代以来,在成百上千来华传教士的引介下和兼具中西学问新式知识分子的模塑下,近代报刊在中国得以迅速地发展起来,读报阅报变得越来越盛行,办报办刊成为一种文化潮流和时尚。先进的中国人尤其是报刊知识分子已然认识到,中国要驯致富强,就必须首先进行内政外交诸方面的改革;而要改革“就必须兴办报业,发挥报刊之先导作用。”^[8]所以,这些倡导者们不遗余力地办报甚至不惜多方募捐、举家借债,也要把报馆开遍“中土”、报社遍及“隙壤”,仿佛是一种天然的使命,目的就是为了使更多的国人了解报刊、走进报刊、重视报刊、投身报刊,通过他们的奋勉努力和笃志行动,广泛宣传报刊的社会作用及报刊对社会变革的影响。

清末民初报刊知识分子普遍认为,报馆与国家大有关系、报刊与社会密切联系,而且这种“理念”似乎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现代国家、现代公民的共识,诚如徐宝璜先生所论:“新闻事业,为神圣的事业;新闻记者,对于社会负有重大之责任。”^[9]以英美发达国家为例(包括后起之秀的近邻日本),它们自近代以来普遍设立了议院、报馆、大学、博物馆等政治讨论、教育文化、新闻出版及公共舆论机构,人们因此得以“开智”和获得“启蒙”。正如《申报》评论的那样,一旦报刊遍布国内,可以“通上下之情,知四方之事,凡国家政教之损益,民间风气之厚薄,无不备载于中。广增见闻,通知时务,便利商贾,攸关教化。”^[10]

对于一个“被动”步入现代化、被迫卷入“全球

化”的国家及其人民而言,报刊这种大众传播媒体,犹如遍布人体的神经系统、好似人身的血脉经络:言路通畅通顺,则民心通顺、民情达练、化民成俗。言论履职尽责则社会安康、政治清明、政府廉洁;舆论公道正派,则社会价值标准公道合理、民众行为举止正派刚直。正是基于报刊肩负着其他文化、教育、学术机构或行政部门无法替代的社会角色、政治功能,报人群体承担着其他社会职业或行业工种难以复制的文化使命、宣教功用,出类拔萃、昌明进取的报人知识分子冀望:在政府的大力推动下,成百上千的报馆矗立在中华大地上或者说在中国辽阔疆域上巍然挺立;在社会的普遍关注下,几乎每一座城市都设有报社,出版至少一份日报或新报。

与其他一般性事物不同,“新闻纸”事业拥有了难能可贵的“公共益处”——先天的优势及得天独厚的长处;报刊理论家、实业家普遍认为,究其缘故是因为报刊之“议论”握有了“直言不讳”的话事权、报人之“秃笔”掌握了“公共舆论”的话语权,进而拥有巨大无朋的言论力量与难以撼动的评论份量。穷苦的底层老百姓与显赫的达官贵人相比,肯定处于下风位置与不利境地,无权无势的普罗大众必然难与有权有枪的军阀政客相抗衡或争锋,他们通常被视为天然弱势、天可怜见的一方。然而,独立自主、自负盈亏的中国报刊为民代言哪怕触怒权贵也在所不惜、为民请命即便侵犯了强权霸道者也毫无畏惧,维护新闻的自由,保持报刊的独立,确保言论的公正。

报刊是改革家、政治家、思想家、宣传家等都十分看事的救国“利器”,乃至推崇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开蒙与觉悟的报刊知识分子对报刊“情有独钟”,利用报刊明是非、辨真假、存公理、发谏论,运用报刊发微阐幽、揭橥真理,他们目光如炬、明察秋毫,笔底波澜、史笔如铁。之所以这般“看重”报刊,是因为它集“新闻纸”“传达纸”“公文纸”于一身,传上下之意、达内外之情。中国报人群体利用报刊来广播知识、发表言论,不仅刊载商品讯情、商业行情和发展商贸事业,更多的是“立言”和“立论”,宣传党派理论、传播政治思想、推动维新变法、消弭各

种积弊、诉说黎民痛苦、启蒙群众智识。中国发展的未来,报人应该作为探索者、力行者承荷先驱之使命;民族前进的方向,报刊应该作为历史的前行者、先驱者而肩荷前导之旗帜。

中国近代新闻史上,报刊知识分子奋力掀起了多次办报高潮,其中以政论报刊尤为显著,“中国知识精英借助报刊论政,将办报作为投身政治活动之起点或主要手段,成为一个令人深刻的历史景象。”^[1]这些新的传播渠道一旦发现、发表体系一经沟通,可以把分散的个人观点及意见迅速地集中起来并加以有效放大、扩散或予以极力鼓吹、灌输,现代公共舆论及意见领袖由此在中国开端。清末民初,越来越多的政治精英、改革家、宣传家及知识分子将报刊作为参政议政的平台及党派竞争的手段,他们或借助合法的手段或依靠租界的特殊地理位置,努力构建相对独立、避免掣肘的话语体系和全新的公共舆论空间,由此形成社会批判言论系统,突出“笔杆子”摇旗呐喊的言论力量。如此,报刊赢得了民心士气,整个社会尊重报刊及其代表和反映的舆论;报人获得了权威地位,全体民众尊崇报人手中的笔。

仅仅大力创建报馆、开办报社还远远不够,还要重视和发挥这些报馆报社的作用,突出和彰显这些报馆报社的职能。对于从事报业者,形成全社会共同重视、共同来做的浓厚氛围,让报人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和名誉,成为令人向往的职业和追觅的“明星”。那么,中国社会不光要“重报”,更要兴报、强报,中国民众要爱报、护报,身体力行维护报刊的运行,义无反顾呵护报人的工作,把“重报”的思想贯彻下去、“重报”的行动落实下去。

值得一提的是,黑暗的封建时代和专制的北洋军阀时期,封闭某家“良”报馆、逮捕某位仗义执言报人的事件时有发生,为清流一时所惋惜、为大众一时所哀叹,但又同时受到正直高尚、善良忠贞之人的崇敬。所谓“重报”,就是要杜绝强权随意抓捕报人、捣毁报馆,钳制口舌、限制言论,精心构建报刊健康成长的社会氛围,悉心为报人开展工作保驾护航。

报刊知识分子兼维新思想家反复重申,报刊之

创建、报人之实践，“倘能够通上下之情，则能地有余利、民有余力、闾阎自饶，盖藏库国帑无虞匮乏矣。”^[12]通过遍设报馆、遍开报社，“务使上下无扞格之虞，臣民泯异同之见，则长治久安之道，固有可预期矣。”^[13]如此一来，国家有了耳目、人民有了喉舌、政府有了木铎，于是“上下相通，民隐得以上达，君惠得以下逮。”^[14]报刊知识分子一再强调，报刊职能的不可或缺，报刊角色的无可替代，突出了“为传递文化之利器、指导社会之南针”^[15]的角色，彰显了“良以报纸为代表舆论机关，苟能根据理性、发挥公平，不但足为社会之南针，且可以感学校之良友，凡一国民智之发展，其机枢实利赖之”^[16]的功用。自那时起，报刊慢慢成为社会舆论的触发者和公共评价的引导者，进而构建起相当强大的文化宣传与思想灌输的攻势，亦成为时代的先声、潮流的前驱、人群的向导，被高度赞誉为“世界之明星，国家之宝筏，人群之木铎，社会之南针，刍荛直陈，籀轩斯采。”^[17]在报刊知识分子眼里，报刊是启迪民智、引导民族“再优质不过”的工具，是启蒙大众、引领民族“再正确不过”的路径，林林总总的报刊、遍地而设的报馆使得国家犹操舟之有舵、罗盘之有针、趋向既定而后驶行求前。正在向现代化转型的国家和渐次开化的社会都要求报刊知识分子——也包括报刊知识分子本身自觉地认为，他们这些先觉先行者，为民族之先知、社会之南针，亦为未来国家之导师、将来社会之表率。

所谓的“重报”，是就整个社会和全体民众而言，而不仅仅指的是政府部门或报刊行业。因此，国家要致力于增加报馆的数量、提高报刊的价值及提升报人的地位：一是重视出版、发行、零售和订阅报刊等工作，广泛兴办报馆、建立报社并形成覆盖全国的报刊网络，吸纳社会各领域精英人士从事报业、参与报务并培育报界名家，看重并发扬报刊的说教及宣导功能；二是重视报刊登发的各种文章尤其各类评论性文章（政论、时评），遴选并择取报上所登载文章的政治智慧与革新谋略，采纳对社会发展与政治改良科学合理的意见和建议。

清末民初，“重报”理念深入人心、形成共识，由

此逐渐成为一种不可阻挡的社会思潮——时人称之为“重报主义”。与重商主义、重农主义等社会思潮一样，报刊知识分子主张“报刊为本位”，即报刊为立国、兴国、强国的根本之途，通过报刊传播西方先进思想学说、推动中国社会改革与文明进步，要求国家予以重视、政府予以扶持、民众予以支撑，以多种手段刺激本国报业的发达、促进本国报界的前进，以确保国家和人民获取足够的自我更新、自我发展的资源，进而在日益激烈的全球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至少不被列强所凌辱和欺侮，其终极目标是国家“驯致富强”、民族“渐次崛起”、人民“豁然觉悟”。

面对近代以来外侮日亟、他国凌夷、列强环伺、虎视鹰瞵的危难时局及民族危亡、国势羸弱、人民愚昧、民智未开的困窘情势，如何改变国弱民困、封建颞顽、风雨飘摇、江河日下之险境，如何改变政治晦涩、经济凋敝、民众蒙蔽、官僚昏聩之现状，开明开放的报刊知识分子们深以为然的是必须维新国民、开启众智，必须灌输学说、改良风气，必须转移风俗、陶冶国民，必须借助西方社会普遍设立的民立报刊、现代教育、议院律法等手段和工具的伟大力量。如果没有报刊深度参与，社会的变革就难以实现、国家的改良就难以完成、民主的进程就难以进行、人们的脑质就难以为之一变；就这个意义而言，“报刊是知识转型和社会变迁的重要动因”^[18]。这些办报诉求的提出，是因为“他们较了解近代报刊在西方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的影响，重视报刊反映民情、传播时事及拉动经济的作用，从而积极地参与到早期国人自办报刊的活动中来”^[19]，他们把办报设刊放在极为重要的位置，形成了“重报”思想和塑造了“重报”精神，并为之不知疲倦地去履践和实施。

三、报刊知识分子须担当政治责任和履行宣教义务

报刊自诞生之日起，就被时代和历史、社会和大众赋予了当仁不让的神圣“天职”——“在上为君耳目、在下作民喉舌”。作为社会信息中枢和传播中介，报刊既上传下达、互通有无又去塞求通、传播天下，这是其他社会事业无法替代的职能、其他公共行

业难以比拟的功用,消除文化、思想之隔膜与“信息不对称”,承担社会教化责任、政治引导职责。

(一)报刊和报人应该报道真实的新闻、传播正确的消息和发布准确的资讯

清末民初,国内出版发行的大小、林林总总的报刊可谓良莠不分、泥沙俱下,它们往往既传“信”、又传“疑”,有可能连报社、报人自己也搞不清楚究竟人物孰是孰非、新闻谁真谁假、事件来龙去脉。因此,在新闻报道过程中不免会出现百密一疏、鱼龙混杂的情况,或有意为之、无心之过,或哗众取宠、博取眼球,或道德失守、伦理失范,让一些无稽之谈、无根之语混入版面,难以保证新闻报道的客观真实、论说时评的公平公正,其新闻传播活动在准确度、可信度、思想性、启发性、教育性等方面还有很大的提高空间。真实的新闻、准确的报道和客观的评议始终是报刊的生命线和底线,任何发展时期或阶段,报刊要做到公道正派、报人要做到耿介正直,始终坚持“事实求是”的新闻写作及报道原则,将真实性、正确性、准确性视为安身立命的命脉;诚然,这有待事实检验和社会核实,有待报人职业素养的提高。循此,报刊立论要坚持大公无私、不偏不党,主张不带私心与偏见、不带预设立场与观念,评鹭事件、品评人物必须完全遵循客观实际及是非标准,严格按照“中立者”的立场、“纯客观”的标准进行客观报道和叙述、开展良心评论和引导。报人对事实进行客观陈述、真实描写、公道评议、公正评价,胸怀坦荡、开明包容、境界崇高、格局超拔,“如饮狂泉”(梁启超语)之“报章”才能具有强大的文字穿透力量和思想灌输价值。

毋庸置疑,摆出事实、中允评析,新闻报道才会有力量;表明事实、叙述中正,舆论宣传才会有说服力。新闻报道以是为是、以非为非,针砭时弊、激浊扬清,实事求是解读事件、公道正派品读人物,不遗余力地探索事物的本来面貌、挖掘新闻事件及其人物背后的真实性、客观性,尽量还原历史的真相及事件的全貌。报刊上面登载和发布的所有文字务必准确无误、真实可信,本着对读者负责、对社会负责、对历史负责的审慎态度采写、编发各类新闻,务必坚守

新闻真实性的底线——报道事实原原本本、编辑写作认认真真、点评议论公公道道。

(二)报刊和报人应该而且必须针砭时弊、指斥权舆

“指伏摘奸”对于担当“审判官”角色的报刊及担任“话事人”的报人来说,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否则,便是一种严重的失职。报刊是正义的象征、舆论的指针,而报人是不是法官的“大法官”。所以,不光报馆、报人自己充满凛然正气且浩气长存,还要奏响社会的正气之歌、发出民众的正义之声,扶助人间的正道与沧桑。正当、规范、合法的舆论监督需要报刊报人拥有极大的勇气,正确深刻、犀利洞彻的大众媒介批评同样需要极大的传播智慧、政治手腕、文化气度和媒体格局。虽然报刊监督政府、向导国民的理由充分、合理,但是弄权祸国、偷奸耍滑、心怀叵测、鱼肉百姓之奸佞还是会情有不甘、心中恼怒,他们肯定视公正的报道和正义的报人为眼中钉、肉中刺。封建时代和北洋军阀时期,封闭某家仗义执言的报馆、逮捕某位耿直忠赤报人的事件时有发生,为清流惋惜、大众哀叹,但同时受到正直高尚、善良忠贞之人的崇敬。不惧刀枪斧钺、不怕鼎镬之刑,是中国传统文化所推崇的文人风骨、清议风采,也是中国社会及民众认可与赞许的“大丈夫精神”。从这个意义而论,如能留名汗青、书写辉煌,报人必将舍生取义、不改初衷甚至虽九死其尤未悔,报馆必将负重前行、踔厉奋发甚至以此为骄傲、以此为荣光。报人向社会呼吁,希望“吾道不孤”:他们谏言社会,与之同志相合、旨趣契合的报馆越来越多;他们倡议报界,担当道义、辣手著文、遵从公理、论扬公论的报刊不断涌现,开通民智更要开化官智,传播知识更要传递智识。

无论如何,报刊总是要对于国家内政外交等大事说一说、议一议,在大是大非面前主持正义、维护公平,在公道正义面前但说无妨、直言无忌;报人毫无疑问地站在普通民众那边、与有权有势的官僚巨贾针锋作对,替底层民众“发声”及弱势民众“代言”,首持公论,力任开化。报刊传播的民主思想、报人传布的民权观念使得底层民众的思想开化、智

慧开启,“脑质为之一变”并逐步具备民主共和思想,极大地动摇了封建统治秩序、撼动了军阀专制堡垒。

(三)报馆言语过激或态度偏颇“不合时宜”

报刊发出的声音与传播的观念、报人站稳的立场与表现的态度,应该“允执厥中”和“抱元守一”,不偏不倚发大公之论、无党无派出公道之声,居“中间人”位置,立“第三方”视角。中国传统文化历来崇尚“中庸之道”,中国知识分子包括普通百姓的基因里向来履践“中庸之法”,坚决摒弃矫枉过正与过犹不及,这是一种大智慧、大谋略。报刊之新闻报道须不偏不倚、大公至正,报人之陈述指称须不左不右、中立中肯;否则,报馆之言论过激或观点偏颇会造成负面影响:对于官长来说,则有莠言乱政、妄事攻击之嫌恶;对于社会来讲,则有畏避权贵、依阿取容之讥消。许多时候,报馆报人的所作所为处于进退两难的尴尬之地——做又不是、里外皆非,真可谓是进退失据、羸角跋扈;假使真的处在如此之两难的处境,又怎能担负批郤导窾的神圣职责?妄事攻伐、莠言干政、搬弄是非、轻佻嬉戏,是清末民初时不少报刊及其主笔的重大缺陷之一,有违新闻伦理、有悖传媒道德、有误职业操守。一些不良报刊及无德报人讨好权贵、依附势力、趋炎附势、欺软怕硬、崇洋媚外、欺上瞒下等为时人所诟病,表现出极大的不公正和不公道;“屁股”一旦坐歪了,观点及态度同样会跑偏。

其实,带有情绪的新闻报道,或多或少有失偏颇;带有预设立场的新闻评论,或明或暗剑走偏锋;带有主观臆断的论断,或隐或现盲目摸象。换言之,言语激烈,难以心平气和、理性明智地开展新闻宣传工作;态度偏激,难免陷入孤芳自赏、刚愎自用;观点片面,往往得出片面结论,或其论点以偏概全、一叶障目。必须提出的是,报刊的评说、议论和报人提出的观点理念、价值标准、行为规范并不具备法律或行政意义上的(强制)效力,只能从新闻舆论及媒体批评上予以曝光或道德层面上进行谴责。舆论虽然充满力量但却不是万能的、言论虽然声势颇大但不过是一种“软约束”,尤其难以抗拒一意孤行的军阀、

固执己见的独裁者、势力滔天的权贵,再硬的笔杆子也无法与强悍的枪杆子相颉颃。

(四)报刊在保持经济独立的前提下才能保证其言论自由不被金钱收买或豢养

开办一家经济独立、言论自主的报馆,在清末民初那个阶段相当不简单。近代以来,中国不少报刊都旋起旋灭、昙花一现,其中最为重要的原因是缺乏经费的保障、缺少资金的挹注,因资金链断开而被迫“中辍”。办报需要充裕的金钱,维系报馆日常经营和运作同样需要不菲的费用。特别地,报刊拥有足够的财富和经费,才能不被利益所驱动、金钱所收买、财阀所利诱、政客所诱惑,进而保持思想的独立性、言论的自主性、市场的主体性及舆论能量、政治尊严、社会声誉、传媒地位、媒体名望,经济独立自主是报刊独立自主的前提。报人要想秉持客观报道、公正评论、无私无偏原则,就不能仰人鼻息、受制于人;要追求真理、寻找真相、还原事实、揭示内幕,就不能被金钱击倒、利益迷惑;要为人民发声、为正义直言,就不能被不义之财俘虏、收买。权贵也好财阀也罢、官僚也好资本家也罢、政府也好洋商也罢,倘若报刊报人竭力做到“为公平正义、做社会良知”,资本不能左右扭曲、金钱不能捆绑驾驭,“这是自新闻事业诞生以来,便被证明的颠扑不破的真理。”^[20]

然而,报刊及报人过度强调营业性、过分追求盈利性极可能造成一系列负面影响甚至是结出“恶果”。唯“金钱”马首是瞻,视“利益”为第一要素,这样的报刊报人既没有社会责任感、也没有生命力。任何报刊报人端上了别人的饭碗就要做到吃别人的饭、说别人话,这不仅是公权力的私用和滥用,本质上是“以权谋私”的腐败。因而,报刊在突出营业性、强调盈利性、追求经济性的同时,时刻不能忘记自己的社会责任、媒体责任、公益责任;报人必须铭记自己担负的文化遗产、知识灌输、教育普及等神圣使命,统筹营利性与公益性、营业性与事业性。所以,办报既要兼顾事业性与经济性、又要平衡营利性与公益性,任何时候都要以文化事业为中心、以公共利益为核心,而不能反其道而行之,甚至出卖读者利益、牺牲公共福利。在报人看来,报刊营利不是目的

而是手段,他们扮演的角色是报刊家而不是报商。

(五)办报是一个需要家国情怀和奉献精神的行当与事业

从精力或精神角度上讲,专职从事新闻传播事业者往往比一般人要焦神劳思、不遑寝处,不仅要挖空心思作文、殚精竭虑发论,而且知识面要比普通人广泛而渊博,既是专才也是全才、既是通才又是杂家,敢为天下先、为生民倡,善于鼓动风潮、造成时势,比如英敛之、邹韬奋等人沉潜时务、精进时事、研习时政,重视报业市场的拓展、营销手段的推广、广告招徕的效率等。更何况,“业新闻纸者”还整日处于畏惧禁锢言论自由的“法纲”和钳制正常有序论说的“权网”,担忧或恐惧陷入官司或置身麻烦等的担惊受怕中。从某种程度上讲,从事新闻与传播事业及其相关实践活动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也是一桩需要下苦功夫的事业,需要奉献精神,呼唤敬业精神,胸怀国之大大者。事实上,早期的报馆也不太盈利、赚钱甚至要折本、亏损,所以“非至愚者、何乐出此?”以办报为终生志业的先进报人知识分子群体,就是存续那么一点“愚昧”或抱有那么一丝“顽固”,执著的信念、坚守的理念、坚韧的挺立、献身的精神,正是报人群体镌刻在骨子里、流淌在血液中的鲜明气质与特征。

报人知识分子是典型的近代报人兼传统文人,既有较为崇高的新闻理想和职业追求,又有坚韧不拔的新闻道德和伦理品质。他们不怕受累、不辞辛劳、不惧官府、不畏人言,不问收获埋头苦干、不问前程风雨兼程,做社会维新的对症药、当政治改革的顶门针,这些深念国忧、心系民瘼的爱国报人矢志不渝地追寻办报理想并引以为终生“志业”。清末民初报刊知识分子始终践行“忘己之为大、无私之为公”^[21]的报刊理想和人生信条,把办报作为践行“以文辅政、以文参政”^[22]的重要途径,为百姓伸张正义,为社会呼吁和平,为国家争取权益,为民主大声呐喊。他们身上既有处士横议、道路传铎的精神面貌,又有采择刍蕘、问计苍生的精神气质,始终想带给苦难深重的国家以民主气象和舆论风尚,促使积弊丛生的国家以开明态度和开放胸襟。人就是报、

报即为人,报刊不仅成为报人们思想与理念的延伸及拓展,而且成为他们浓郁“家国情怀”的集中展现,将其爱国主义“精气神”展露无遗。

四、结语

以英敛之、王韬为代表的清末民初报人论扬道:“报馆为国民耳目、喉舌。善之者,则监督向导、转移社会,天职非轻;恶之者,则处士横议、颠倒是非,憎兹多口。”^[23]清末民初创办的众多报刊甘作国民的“耳目”和“喉舌”,是国民利益的维护者和国民福祉的代言人,不仅扮演“监督政府”“向导国民”的天职,而且承担“转移风俗”“灌输知识”的任务。面对清末民初国家衰败、民族式微的情势,主张师法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报人,“希望以知识分子兼天主教徒的身份拯济天下、献身社会”^[24],同时冀望其他先进的报刊知识分子也和自己一样“以天下为己任”。事实上,在中国近现代新闻事业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一代一代新闻人用开山辟路、以启山林的探索精神,不断思考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和总结实践中的办报经验”^[25],其中最为重要一点就是报刊要有益于人民、报馆要有益于国是、报人尽己之天职。新兴的办报机构和新式的报业机关不仅是国家的侦察兵和瞭望哨、也是人民的耳目与喉舌,为国家和社会收集信息、研判情报、提供咨询、充当智囊、建言献策、贡献刍蕘,为民族和民众发出自己的声音、说出自己的观点、表达自己的情感和诉求,反映社会舆论和人民意志,为推进国家维新、社会改良而笃行“我有笔如刀”,并为之奋力摇旗呐喊。社会需要公平公正的“良心报刊”,公众呼唤有正义感、使命感的“良知报人”,闻达敏捷、承荷道义的报刊知识分子是时代的“眼睛”、国家的“参谋”、社会的“良心”及公众的“向导”,这一点百年未变。市场经济条件下,处今日之转型的报刊知识分子更应赓续与弘扬。

近代时期,国势衰微至此、民族沦落至此,没有什么比民族复兴、国家重振更加重要的事情,没有什么比开启民智、挽救愚民更加紧迫的任务。对于极度贫困、衰弱的旧中国而言,要改变当时积贫积弱的面貌和唤醒大众、振起人民,报刊知识分子作为“先觉觉后觉者”必须充当新文化的宣传者、新思想的

传播者、新民人的启蒙者,在办报强国、新闻救国方面“担纲领衔”,在鼓舞士气、激励斗志方面“走在前列”。有鉴于此,一批批开明开放、坚毅果决的报人群体敏锐且预见性地指出,在“中土”推广和扩张近代报刊,正合时宜且时不我待。

参考文献:

- [1]施欣.论中国古代报刊近代化嬗演的历程、特征与启悟[J].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6,(3):98-104.
- [2]贾小叶.“革命瓜分论”与辛亥革命[J].历史研究,2024,(10):121-145.
- [3]杨军,龙秀.论当代中国技术民族主义思潮的出场、影响与引领[J].廊坊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3):98-105.
- [4][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M].袁翰青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3.
- [5]郑丽平.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生成逻辑论析[J].湖南社会科学,2024,(2):1-8.
- [6]李侃.中国近代史 1840—1919(第四版)[M].北京:中华书局,1994:227.
- [7]朱维铮,李天纲.万国公报文选[M].上海:三联书店,1998:96.
- [8][新加坡]卓南生.从近代华文报业的演变看华文报的特征与使命[C].南京:首届世界华文传媒论坛论文集,2021:200.
- [9]邓绍根.百年奠基:论徐宝璜新闻传播教育的历史贡献和遗产[J].出版发行研究,2018,(10):5-12.
- [10]刘海燕.基层社会的播扬者:上海民众教育馆研究[D].华东师范大学,2023:1.
- [11]李礼.转向大众:晚清报人的兴起与转变(1872—1912)[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3.
- [12]王韬.弢园文录外编[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96.
- [13]夏东元.郑观应集[M].北京:中华书局,2013:103.
- [14]阎小波.何以安民:现代国家“根本性议程”的赓续与创制——以王韬、李大钊和毛泽东为中心的讨论[J].文史哲,2020,(2):5-20.
- [15]沈恩孚.《新闻报》三十年纪念册[M].上海:新闻报馆,1923:1.
- [16]天津历史博物馆编委会编.北洋军阀史料[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6:568.
- [17]施欣.《大公报》创始人英敛之研究[D].湖南师范大学,2018:1-2.
- [18]沈毅.中国经济新闻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46.
- [19]赵建国.清季报刊对海权论的传播[J].学术月刊,2023,(6):193-205.
- [20]施欣.招徕有法·经营见道:摭谈《生活》周刊的广告理念与策略及其当代镜鉴[J].现代广告,2024,(21):56-64.
- [21]徐新平.以大公之心,发折中之论:《大公报》创始人英敛之的新闻思想[J].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5):149-155.
- [22]张勇丽.清末民初新闻人英敛之研究[D].南京师范大学,2019:1.
- [23]英敛之.论看报的好处[J].大公报,1922-06-22(附件).
- [24]周萍萍.立足本土 会通中西——英敛之的教育思想与实践[J].基督宗教研究,2021,(2):342-358.
- [25]徐新平.晚清新闻思想研究[M].北京:学习出版社,2022:1.

(责任编辑 陆晓宇)